

吉朋

羅馬帝國衰亡史



吉朋著 / 梅寅生譯

羅馬帝國衰亡史

(簡明版)

楓城叢書之四

楓城叢書之四

羅馬帝國衰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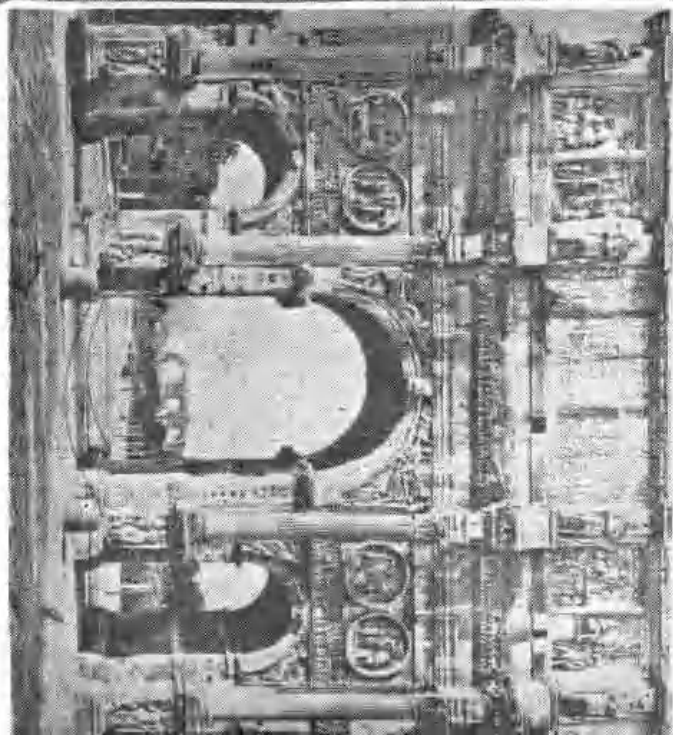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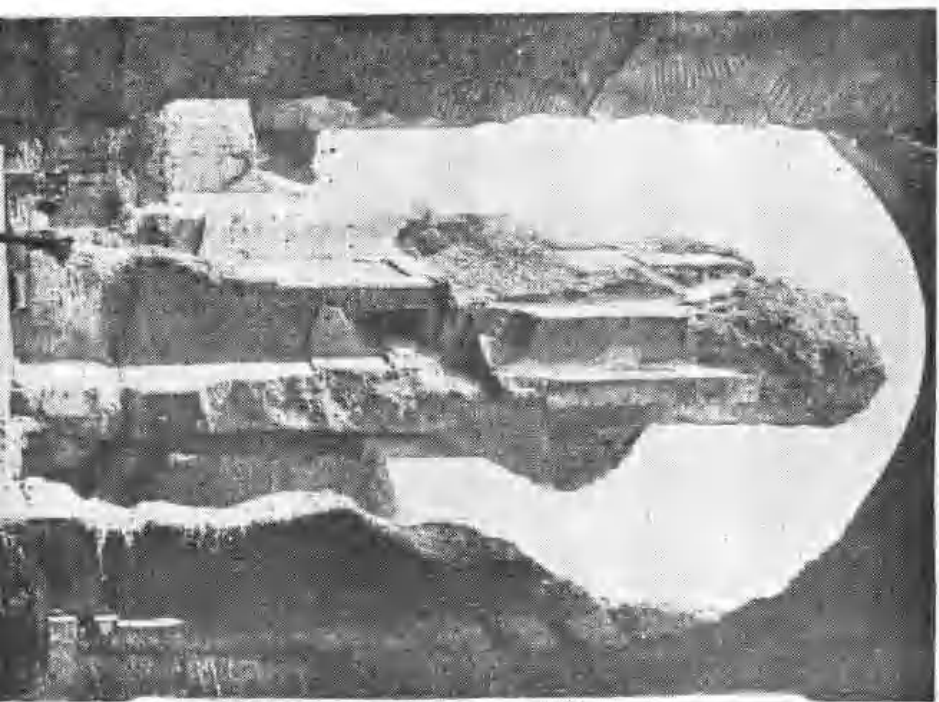
作	著	吉	朋	Edward	Gibbon
譯	者	梅		寅	生
發	行	廖		文	遠
出	版	楓	城	出	版
發	行	楓	城	出	版
總	經	楓	城	圖	書
				供	應
				社	
				新	竹
				市	文
				昌	街
				73	號
				劃	撥
				帳	號
				104063	廖
				廖	文
				遠	戶
				電	話
				：	(035) 22186
印	刷	者	協	林	印
			協	林	印
			書	館	有
			限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貴	陽	街
			二	段	232
			巷	4	號
			電	話	：
			三	三	一
			九	一	七
			二		
定	價	65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七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九	月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469	號

發現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版權，不准翻印



吉 明

本幀照片承蒙英國國家肖像繪廊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提供
本中譯本轉載，特此申謝。



▲ 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

▲ 吉萨大金字塔



► 奥理安帝纪念柱



吉朋

羅馬帝國衰亡史

編者前言

十月十五日將近黃昏的時候，當我坐着凝

視羅馬的神廟，靜聽赤足托鉢僧在廟內朗

誦應答祈禱，我的歷史寫作的動機，開始

孕育。

——吉朋的自傳

沒有一張重要典籍表，可以簡略得不列舉「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也沒有好學之士，專心別事而置此書於不顧者，「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主題，是有記載的歷史中，最令人悶氣的史實——不是一個國

家的瓦解，而是一個古老、豐富，並顯然不能毀滅的文明之解體。

此書結構堂皇，文辭莊嚴。正適合其主題之崇高。我們文學作品中，就高尚而論，無一散文巨著堪與媲美，縱使我們對過去有意義的經驗，漠不關心，對書中莊嚴言辭的魔力，充耳不聞，但在人類對軍事及政治考驗反應的不變型態上，吉朋鞭辟入裏之領悟，至今仍極爲得體。吉朋乃第一流作家，因爲他對通常和特殊事例，均同樣地關注；同時也因爲他是一位哲學家，又是編年史家。

因爲此書是件藝術品，融滙哲學、編年史及不朽的語言於一個雄偉而平衡的結構中，故此書以節縮本問世，其掛一漏萬，不啻用一根圓柱和一片浮雕，來介紹巴特農神殿（Parthenon），或以摘要介紹「失樂園」（Paradise Lost）。

吉朋之鉅著本來應讀足本，希望有人或因此簡明本的誘導，而讀「羅馬帝國衰亡史」全書。但是，早幾個世紀的從容，已成明日黃花，而今天像「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樣的鉅構，當由一羣專門學者來執筆，由另一些專門學者研讀介紹。爲了使吉朋之鉅著，得與較廣而有資格讀此書的大眾接觸，簡明本不但合理，亦有此必要。

簡明本之主旨，在介紹吉朋原著之精華及其中心主題，並非將原著改寫成後期羅馬史之教科書，因此，凡長而重要的段落，均保持其原來面目，在專例詳述方面，當以濃縮似屬理想時，上下文中不相關的句子，則予拼合，但仍以適用於本程序者爲準，有些地方，編者亦予簡述以便承轉。

凡原著中之細節，其過於詳細或過時，而並不太切題者，均大刀

闊斧地刪略；諸如戰爭，政治商談之詳情，書中不重要角色性格之描寫，行政及法律細節，神學和宗派之討論，回教之興起，十字軍東征，羅馬帝國以外諸民族之歷史及其描寫，以及羅馬帝國淪亡後，歐亞兩洲諸國之歷史及羅馬教皇制度等均屬之；但獨到之觀察及結論，在可能範圍內，均納入簡明本中。

海達士 (MOSES HADAS) 譯

梅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序

杜維運

吉朋 (Edward Gibbon, 1737-1794) 在完成其大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後，又寫了一本自傳，追溯其寫史的動機與計劃：

「這是在十月十五日將近黃昏的時候，當我坐着凝視羅馬的神廟，靜聽赤足托鉢僧在神廟內朗誦應答祈禱，我的歷史寫作的動機，開始孕育。」（註一）

「我的原來計劃，祇限於羅馬本身的衰頹，而不是帝國；即使到我的閱讀與思想開始趨向帝國方面，仍又經歷好些年，我才認真執行這項繁重的工作。」（註二）

「我逐漸從願望進到希望，從希望進到計劃，從計劃進而執行我的史學工作。……那裏曾想到最後寫到六大本，並消耗了二十年的歲月。」（註三）

在一剎那間，吉朋的精神與羅馬的精神合而為一，於是他從一七七一年開始撰寫這部大著，到一七八七年完成。由心靈上的體會，到繁重工作的執行；由羅馬一城的衰頹，到整個羅馬帝國的傾覆，於是人類史學史上，驟然出現了一部光芒萬丈的傑作。

吉朋在寫作的過程中，是歷盡甘苦的。他不但儘量使其所運用的材料，正確無誤，同時

極力追求文章的優美。精神上的領悟，與其在文字上的慘澹經營，適成極強烈的對比。所以在他的名著問世以後，頌聲紛至，被推爲是一部學術名著，也是一部文學傑作。這種雙重成就，影響於英國的歷史寫作，至深且鉅。雖然十九世紀以後，科學風靡了歐洲史學界，歷史與文學分離，而英國則在吉朋的影響下，歷史與文學仍有其密切的關係，史學家於求客觀與博學以外，仍然講究文體的潔美。就這一點來講，中英史學是相當接近的。

吉朋的大著，也具有中國史書的不朽特性。中國班馬之史，陳范之書，如日月麗天，歷萬古而常新，後有作者，踵事增華則可，而不能將其完全代替。西方的史書則不然，一部極爲流行的著作，往往不數年而被代替焉，往往數十年而銷聲歛跡焉。古希臘史學家的作品，固已僅有古典文學的價值，十九世紀英國大史學家麥考萊 (Lord Macaulay, 1800-1859) 的英國史 (History of England)，及喀萊爾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的法國革命史 (The French Revolution)，也早爲以後的英國史與法國革命史所代替。惟吉朋的書則歷經二百年而仍傲視西方史學界，沒有一部類似的書可以將它代替，這是一部有不朽價值的史學名著。置諸中國史學著作之林，實史記、漢書之流亞。

翻譯西方史學名著，爲史學增添新產業，是近代中國史學界極重要的一項工作。民國以來，史學界殫力於翻譯者，頗有其人。如何炳松的翻譯魯賓孫 (J. H. Robinson) 的新史學 (The New History, 1912)，李思純的翻譯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 (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 合著的史學原論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1897), 王任光的翻譯卡耳 (E. H. Carr) 的歷史論集 (What is History?, 1961), 對於輸入西方的史學理論與方法, 都居功甚偉。翻譯通史與斷代史一類的史書者, 則多以西方一般教科書為對象, 罕能及於名著。以致西方大史學家的名著, 被冷落埋沒, 坊間所充斥者, 幾盡是二流以下的作品。像吉朋的大著, 竟未有人問津, 應是最好的說明了! 晚近治中國史學的西方漢學家, 競譯中國的史記、漢書、通鑑, 而國人則不譯吉朋和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之書, 這是不是奢談吸收西方史學的諷刺呢?

梅寅生先生遷居新竹, 以讀書譯述自娛, 極喜吉朋之書, 傾數年之力, 將該書的節縮本譯為中文。余讀其前數章, 歎其譯文的雅潔, 志趣的高遠。今假數日之暇, 讀其全文, 尤深讚佩。寅生先生不是職業史學家, 而做了職業史學家所應當做的大工作! 倘能進一步將吉朋的全書譯出, 則更是史學上的盛事了。

序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

(附一) The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edited by John Murray, pp. 405-406
(memoir D).

(註 1) Ibid, Pp. 270-271 (memoir C).

(註 1) Ibid, P. 411 (memoir D).